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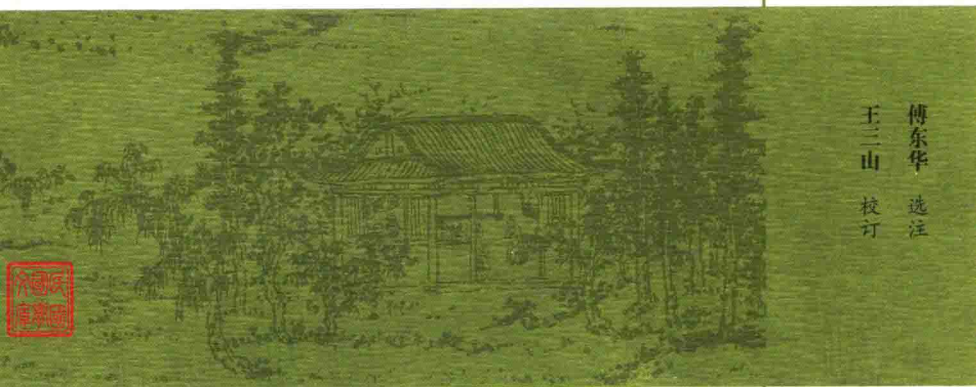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李白诗

傅东华 选注

王三山 校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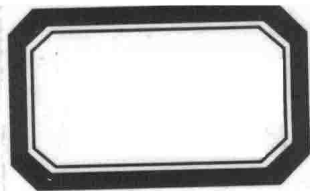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李白詩

卷四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李白诗

LI BAI SHI

傅东华 选注

王三山 校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白诗 / 傅东华选注;王三山校订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59-8

I. ①李… II. ①傅… ②王… III. ①唐诗—诗集 IV. ①I222.7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563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李白诗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6.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59-8

定 价:16.0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 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李白评传

痛饮狂歌空度日，

飞扬跋扈为谁雄？（杜甫《赠李白》）

关于李白生平事迹的记载，比较的要算很丰富：新、旧《唐书》都有他的传；同时人及后代人替他作的碑志和序、文也供给我们许多材料。此外，后代人所作的笔记、地志之类，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的记载。不过记载愈多，歧异的地方也愈多：即以他的籍贯而论，有的说是陇西成纪人^①，有的说是蜀人^②，有的说是山东人^③，几乎叫人不知相信哪一说为是。但经我们把各种材料汇合起来，证以他自己诗文所述，这才知道所谓陇西成纪人者，是指他的先世族望而言；所谓蜀人者，是指他的生长之地而言；所谓山东人者，则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也。但有一部分的记载，或我们明明晓得它是附会的，或因它缺乏别的证据，所以都当在摈斥之列。例如后人因贺知章曾称他为“谪仙”，便附会起来，说他是天上太白星降世；而相传为柳宗元所撰的《龙城录》，则又附会韩愈说太白仙去的一句话，竟谓“元和初，有人自北海来，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，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，太白耸身健步，追及共乘之而东走”云云。又《天宝遗事》所谓“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，后天

才赡逸，名闻天下”云云。我们若是取郑重的态度，当然是不把这些记载当做史料看的。又如因杜甫和元稹诗中曾有“山东李白”之语，后来刘昫撰《旧唐书》，竟以白为山东人，且说“父为任城尉，因家焉”。我们因为找不出别的证据，且与李白自己的诗文所述不符，故也只得信了。

若是依据比较可信的记载^④，更证之以集中的诗文，则我们可知太白的家世和生平约略如次：

李白，字太白，是汉将军陇西人李广的后裔^⑤，凉武昭王暕的九世孙^⑥。隋末，他的先世以罪避居西域，隐姓易名，及至唐武后时，子孙始还内地。父名客，家于蜀之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；太白以武后长安元年（701）^⑦生于此。

他自己的诗文里，记他少年时的轶事有好几件^⑧，我们因晓得他彼时是个性情豪放、好击剑任侠、轻财重施、不事产业、而且目中无人的少年；又知他彼时的文章便已颇惹人注意了。

我们只晓得他在二十六七岁以前便已出游襄汉，南泛洞庭，东至金陵、扬州，更客汝海，还憩云梦^⑨。我们不晓得他最初“杖剑去国”究竟在哪一年，但总不在二十五六以后；又晓得他此次出游，便始终不返故乡：从知他凡在蜀中的作品，必都是二十五六以前的作品。

据《唐诗纪事》引东蜀杨天惠《彰明逸事》云：“……太白齿方少，英气溢发；诸为诗文，微类《宫中行乐词》体。今邑人所藏百篇，大抵皆格律也。虽颇体弱，然短羽襍

襪，已有凤雏态。淳化中，县令杨遂为之引，谓为少作是也。”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云：“蜀本《太白集》附入《左绵邑》人所哀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，尤为浅俗。”现在这“杨遂为之引”的百篇和蜀本《太白集》所附的六十篇，均已不可见；但看如今通行集本所载蜀中所作诗——如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（本编入选），《登峨嵋山》《登锦城散花楼》等——也就可略见他的所谓“少作”风格的一斑了。

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所云“妻以孙女”的“许相公”，乃是许圜师^⑩。他是许绍的少子，本高阳人，梁末徙居安陆（唐时为安州，今湖北安陆）。其人有器干，博涉文艺，举进士。累迁黄门侍郎。龙朔中（661—663）为左相。

他自安陆入赘后，一住十年，自谓“酒隐”^⑪。他在这十年里面，虽自说是“好闲复爱仙”^⑫，其实已急急要想“颖脱而出”^⑬，更忍耐不住当初那种“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”^⑭的境地了。原来他此时感着“孤剑谁托，悲歌自怜；迫于栖惶，席不暇暖；奇绝国而何仰，若浮云而无依；南徙莫从，北游失路”^⑮，所以急乎要想投身于一二所谓“君侯”也者，藉可“收名定价”^⑯。他此时觉着要“出宇宙之寥廓，登云天之渺茫”^⑰，是难实践的；所以转了一念，而主张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；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”^⑱了。

但是他这种活动，似乎并没有成功，因为他到三十五岁的时候，还仍旧惘惘然的作客太原^⑲。于此，倒反提拔了一个郭子仪，使他后来竟成就一翻轰轰烈烈的功业。

从太原又东游齐鲁，遂寓家于任城（今山东济宁）。我们虽不能确然晓得移寓在哪一年，却知他侨寓鲁中颇久，故竟被人认做山东人了。

《游太山》诗六首（本编入选），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你看他说：“凭崖览八极，日尽长空闲”，可见他彼时感着非常寂寞。

天宝初年，太白游会稽，与道士吴筠善，荐之于朝，又得秘监贺知章为之称誉，乃得玄宗以奇才相待，征入京师，“召见金銮殿，论当世事，奏颂一篇；帝赐食，亲为调羹；有诏供奉翰林”^②。总算他的初志已遂。你看他临别时说：“归时倘佩黄金印，莫见苏秦不下机”^③，也可见他心中的得意不期流露了。

无如他生性浪漫，且复恃才傲物，想来得罪人处一定不少，所以在翰林不过三年，竟不为亲近所容，而被优诏罢遣了^④。在这三年里面，他做了好些极优美的纯粹艺术作品，如《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》《宫中行乐词》（以上本编未收），《清平调词》（本编入选）等，至今犹脍炙人口，向来做香艳宫词体的莫不奉为楷模。盖彼时他正“承恩初入银台门，著书独在金銮殿。龙驹雕镫白玉鞍，象床绮食黄金盘。当时笑我微贱者，却来请谒为交欢”^⑤——实是生平最得意的一段时期，故能把他的艺术伎俩尽情施展。

且我们晓得他“少年落魄楚汉间，风尘萧瑟多苦颜”^⑥；此时年纪已过四十，始得“一朝君王垂拂拭”^⑦，故愿“壮

心剖出酬知己”^⑧，而不肯便舍去，乃是情理中事。他彼时本想“待吾尽节报明主，然后相携卧白云”^⑨的，故和他同为“酒中八仙”之一的贺知章临当告老归山的时候^⑩，他尚“借问欲栖珠树鹤，何时却向帝城飞”^⑪——似乎有还希望他再出山的意思。又谁知这个金马玉堂，非是他这种浪漫的人物所能久居的；这似至遭谗之后，他始有所觉悟，故《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》的诗里，便说“同归无早晚，颍水有清源”——已决然有去志了。

去京之后，仍旧去做他的漫游生活：北抵“赵、魏、燕、晋（河北、山西及河南北部），西涉邠、岐（陕西），历商于（河南淅川县西），至洛阳，南游淮泗（安徽北部），再入会稽，而家寓鲁中；故时往来齐鲁间，前后十年，中惟游梁宋（河南北部）最久”^⑫。他和杜甫会见，就在这个期间。而且这十年里面，他的作品特别丰富；我们只看《梁园吟》^⑬一篇，可见他满腹牢骚，因而纵酒浪游，渐渐流于颓废的态度；又可见他的诗的风格，也似乎比从前更加豪放了。然而他仍旧还没有死心塌地，所以终于说：“东山高卧时起来，欲济苍生未应晚。”

天宝十四载（时太白五十五岁）十二月，安禄山反于范阳，率众南下，所过州县，望风瓦解。未几，洛阳陷没。明年，长安亦不守；玄宗奔蜀，肃宗即位于灵武。如此骚乱情形，由太白诗里反映出来的颇不少：例如《猛虎行》一篇，正是记载时事，并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激的。彼时他正作客

宣城，旋由宣城至溧阳^②，又至剡中^③，遂入庐山^④。因为他看看中原大乱，虽然孤愤，却知自己并无权位，要想“一箭落旄头”^⑤，究竟是一种梦想；所以竟说“吾非济代人，且隐屏风叠”^⑥。又谁知隐居未稳，又刚刚遇着永王璘东巡之事，把他牵涉在内，使他暮年的生命之流里又起了一个极大的波澜。

永王璘是玄宗第十六子。天宝十五载（即肃宗至德元年）六月，玄宗奔蜀，至汉中郡，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路四道节度探访等使，江陵郡大都督。七月，璘至襄阳；九月，至江陵，召募士卒得数万人。时，江淮租赋巨亿万，所在山委，恣情破用。肃宗闻之，诏璘还觐上皇于蜀，璘不从命。其子襄成王偁，勇而有力，握兵权，为左右眩惑，遂谋狂悖，劝璘取金陵。璘从子谋，遂于十二月擅引舟师东下；旋为河南招讨判官李铣所败，璘中矢被执，偁亦为乱兵所害。时太白在永王幕中为僚佐，及兵败，乃亡走彭泽，坐系浔阳狱。

于此有一点，颇饶研究的趣味，即太白之入永王幕，为自动的抑为被动的问题是也。据《旧唐书》，谓“元宗……以永王璘为……节度使，白在宣州谒见，遂辟从事”云云，那末是自动的了。但他的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中，则言“属逆胡暴乱，避地庐山；遇永王东巡，胁行中道；奔走却至彭泽”。《忆旧游书怀诗》亦云：“仆卧香炉顶，餐霞嗽瑶泉。半夜水军来，浔阳满旌旃。空名适自娱，迫胁上楼

船。”那末似乎完全是被动的。后人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注意。以为永王既以谋逆而兵败，就要算是叛臣；太白若果自动的身事叛臣，岂不是他的声名的一个大污点？所以一般为太白回护的论者，都宁相信他自己的“胁从”之说，而认《旧唐书》的“谒见”之说为非事实。例如苏轼云^⑦：“太白之从永王璘，当由胁迫。不然，璘之狂肆寝陋，虽庸人知其必败也。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，而不能知璘之无成，此理之必不然者也。”但是这种据“理”来推定事实的办法，也很靠不住。我们看他的《永王东巡歌》十一首之二云：“三川北虜乱如麻，四海南奔似永嘉。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。”可见他当时明明以谢东山济世自任，这岂也是“胁迫”而成的吗？又《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》诗云：“英王受庙略，秉钺清南边……愿与四座公，静谈金匱篇。齐心戴朝恩，不惜微躯捐。所冀旄头灭，功成迫鲁连。”这难道又是违心之言吗？故我们持平而论，当知太白用世之心，是始终没有泯灭的：他自去京之后，浪游十有余年，胸中的牢骚并未稍减；虽经乱离后，且在庐山小隐，却自己也明说并非没有再出山的意思，所以此番永王东巡，正是他出山用世的一个好机会，那末《旧唐书》所谓“谒见”之说，亦非不可信。至于后来永王谋逆，或者因他不从而确曾出于胁迫，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事变骤来，不及防备，而永王之兵又败得很速；他仓卒间逃还浔阳，使人不明他究为被胁而逃抑为兵败而逃，因而竟不免株连了。亮哉蔡宽夫之言曰^⑧：

太白岂从人为乱者？盖其学本出纵横，以气侠自任；当中原扰攘之时，欲藉之以立功名耳。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，固未必有成功，而知人料事，尤其所难。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，而欲仰以立事，不能如孔巢父、萧颖士察于未萌，斯可矣。若其志，亦可哀矣！

彼时他以衰暮之年而犹不免身在縲绁，致使一门骨肉离散，“兄九江兮弟三峡，悲羽化之难齐；穆陵关北愁爱子，豫章天南隔老妻”^⑧，自无怪他要“万愤结缉，忧从中催”^⑨了。犹幸后来宣慰大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昭雪。若思率兵赴河南，释其囚，使参谋军事，并上书荐白才可用，不报^⑩。

但至次年（即乾元元年），终以永王事流夜郎，遂泛洞庭，上三峡，至巫山。又明年，未至夜郎，遇赦得释。自是更游金陵、宣城、历阳等处。最后往依当涂令李阳冰。于宝应元年（762）十一月以疾卒于当涂，时年六十二。

我们看这五六年里面的作品，未赦以前，则但有哀怨怀旧之情，已少孤愤激昂之慨，例如《流夜郎赠辛判官》诗云：

昔在长安醉花柳，五侯七贵同杯酒。气岸遥凌豪士前，风流肯落他人后？夫子红颜我少年，章台走马着金鞭。文章献纳麒麟殿，歌舞淹留玳瑁筵。与君自谓长如此，宁知草动风尘起。函谷忽惊胡马来，秦宫桃李向明开。我愁远谪夜郎去，何日金鸡放赦回！

遇赦之后，虽则壮心未全死，却为老病所困，兴致渐衰^②，故对于世事觉着虚空，而仍入于颓废。然而颓废之中，仍旧不脱向来那种豪放之气，这由于诗人的个性，是不会因境遇而全然改变的。例如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诗^③后段云：

人闷还心闷，苦辛长苦辛。愁来饮酒二千石，寒灰重暖生阳春。山公醉后能骑马，别是风流贤主人。头陀云月多僧气，山水何曾称人意？不然鸣笳按鼓戏，沧流呼取江南女儿鼓棹讴。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，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。赤壁争雄如梦里，且须歌舞宽离忧。

至其绝命一词^④云：

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余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左^⑤袂。后人得之传此；仲尼亡兮，谁为出涕！

我们读此诗时，觉得一股磅礴之气横溢言表；比之陶渊明《自挽词》那种“荒草何茫茫，白杨亦萧萧”的苍凉声调自是不同。故说太白至死不失其浩然之气可也。

据《魏序》，太白凡四娶：其一许氏，已如上述；其一刘氏，又其一为鲁之妇人，已失其姓氏，今皆不复可考。又谓“终娶于宋”。按太白《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》诗有“我非东床人，令姊忝齐眉”之句，则终娶者或即宗璟之姊，而“宋”字或即“宗”字之讹耳。又按《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》有“多君相门女，学道爱神仙”之句，可知太白小隐庐山时，其许氏夫人必尚在也。

太白自己但言有一子一女：子曰伯禽，女曰平阳^⑥。《魏